

龟兹石窟题记与丝绸之路文献整理

朱玉麒

在龟兹石窟运用影像学、建筑学、考古学等方式获得丰富研究成果之后，这是第一次，龟兹石窟用大量遗存的以龟兹语为主的语言方式，告知我们蕴藏在石窟遗迹下一个绿洲王国曾经的历史记忆。

连着两次来上海，都为龟兹的活动。上一次在青浦，2019年年底，参加龟兹研究院徐永明院长带领的“丝路遗韵·五彩龟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展”开幕式。你可以想象：青浦的老太太努力念出“归兹”的读音时，被刚刚经过龟兹文化培训的保安纠正作“秋词”时的尴尬。“龟”“兹”这两个毫不搭界的汉字纠缠在一起，而且还不是读各自原来的发音，真是令人郁闷。这一次，是在郁金香开遍沪上的早春二月，参加中西书局召集的《龟兹石窟题记》出版座谈会。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王国，两千年以前，它就在丝绸之路之上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而被历史著作所记录。两千年以后，这个改变了“龟兹”二字现代汉语正常读音的地方，早已留在了历史深处。我们一直用相对丰富的汉语史料力图打开龟兹历史的大门。譬如19世纪末期（1879年），在古代龟兹王国北境发现的刘平国碑，寥寥百字，与传世资料互相印证，让我们解读出不少古代龟兹王国的秘密。汉语史料关于龟兹记载的丰富性，也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在西域的重要影响。但是，汉语毕竟不是古代龟兹王国的通用语言，借助于汉语史料，我们只开启了那个神秘国度大门的缝隙。现在，以解读龟兹语为主要内容的《龟兹石窟题记》，则推开了进入古代龟兹佛教王国秘境花园的半扇大门。

龟兹语是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古代龟兹王国居民使用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老语种，这种语言直到上世纪初1908年，才由两位德国的梵文字学西格（Emil Sieg）和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根据西方探险家从龟兹本土带走的残存文献，发表了首次解读成果，成为开启焉耆语和龟兹语解读的破冰之旅。彼时丝路北道上的两大绿洲王国焉耆和龟兹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吐火罗语”，分别命名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而在中外前辈学者开创的龟兹语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古代龟兹王国境内大量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还大多没有得到解读。《龟兹石窟题记》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皇皇巨著的龟兹语研究丛书。它第一次全面清理了龟兹石窟群中七大石窟寺的700多条题记，以及龟兹研究院收藏的木简、经籍残片和陶片陶罐上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解读对象以龟兹语为主，而又兼及梵语、据史德语、回鹘语、粟特语等古代胡语，在龟兹佛教和世俗社会历史的多个方面，为学界带来了大量新资料。在龟兹石窟运用影像学、建筑学、考古学等方式获得丰富研究成果之后，这是第一次，龟兹石窟用大量遗存的以龟兹语为主的语言方式，告知我们蕴藏在石窟遗迹下一个绿洲王国曾经的历史记忆。

作为参与者，我亲历《龟兹石窟题记》成书的全过程，十多年来，对这本书感性的认识超越文本本身。2009年5月，我还是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从乌鲁木齐迎接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率领的三位同学，乘车穿行800公里的路程到达库车，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才进入实质性阶段。从那时起，直到2020年年底触摸到《龟兹石窟题记》样书封面，这趟“旅程”终于结出硕果。

这本书代表着中国学术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让我充满感念。首先让我感念的，是龟兹石窟的守护者。龟兹研究院管辖的石窟寺，分散在僻静的古称龟兹东西川的河谷地带96平方公里的荒山之中，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在艰苦的守候中与现代



存在于古代龟兹王国境内大量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大多一直未得到解读。《龟兹石窟题记》第一次全面清理了分散在古称龟兹东西川的河谷地带96平方公里荒山之中七大石窟寺的700多条题记，以及其他部分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图为石窟中所需释读文字的线描示意图。

都市生活失之交臂。在交通日益便利、破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守候，使石窟遗迹依旧完好。那些最为脆弱的石窟题记，在人为和天然的侵蚀之中，能够跨越千年，在《龟兹石窟题记》中得到释读，题记中对于石窟寺精美的线描图像和精确的物理描述，使得历史语言学的文本受益于考古、艺术、历史、文献等学科，这完全不同于当地研究人员长期的全面调查与忠实记录。

为了龟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政府和文物部门也竭尽全力。譬如，为相关研究人员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安排了住房和冬季从事研究的场所。但冬天一过，他们又扑向了大山深处的石窟群中。这种奔波的生活，像转场的牧民，像迁徙的候鸟，毫无疑问影响了子女的入学和对于家庭的照顾。因此，《龟兹石窟题记》这本书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是对这些大山深处的守候者最好的交代。

龟兹石窟群的完善保护，让我想起20年前同样是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在文明冲突中惨遭毁灭的情景。在葱岭东西的同一条丝路上，与这处“阿富汗民族的灾难”相比，我们自豪于多民族聚居的今日新疆，佛教石窟作为文明的遗迹，被各民族珍惜、保护的现状。《龟兹石窟题记》序言列出的龟兹研究院参与队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支多民族的队伍在长年守护与研究着这一片石窟遗址群。主编赵莉是一位回族学者，对龟兹的每一个石窟形制如数家珍，尤其对于100多年来被各国探险队盗掘毁画的斑斑墙壁铭记在心。调查壁画海外流失情况，以数码技术“让龟兹石窟壁画复原回家”，是她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研究者中的主力台来提·乌布力研究员是一位维吾尔族学者，是察哈台语文献的资深研究者，对于龟兹石窟各种民族语文题记在石窟中的位置，也烂熟于胸。他在龟兹石窟二十多年的守望，使得700多条题记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悉数提出。他常常说：“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佛教遗址，更是我们新疆自古以来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其次让我感念的，是中国终于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在西域历史语言的领域引领研究。在龟兹语、焉耆语被释读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已故的季羨林教授是从事这种语言研究的唯一中国学者。进入21世纪不久，垂暮

之年的季先生和冯其庸先生联袂提议，加强中国对于西域历史语言的研究。这个倡议得到中央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此得以成立。没过多久，在法国攻读吐火罗语专业的获原裕敏、庆昭蓉两位博士毕业后，分别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他们从读书时代起就向往从事龟兹石窟题记的释读，在荣新江教授的组织下，终于得到学以致用的机会。

我还记得2009年5月的库车，日本青年获原裕敏和台湾姑娘庆昭蓉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内陆的边疆小城。获原最初身体也略感不适，但没有什么比在克孜尔石窟群的亦狭克沟石窟中释读出“耶婆瑟鸡”这一龟兹语地名更令他兴奋的事了。获原的吐火罗语佛教文献研究非常出色，庆昭蓉则更偏重于吐火罗语世俗文献和龟兹文明的历史学解读，她本科时代物理学和人类学专业的学术背景，更为《龟兹石窟题记》绘制专业的图版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他们从事龟兹石窟题记研究过程中，龟兹研究院还迎来“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为龟兹石窟题记阶段性成果的公布提供了机会。吐火罗语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就这样在中国建构起来。

这部代表着龟兹语研究最新成果的《龟兹石窟题记》以中文形式首先出版，也让我感念上海这个距离龟兹石窟非常遥远的滨海城市。将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吐火罗语研究最新成果奉献给学界，体现了作为现代化都市的上海在出版行业引领学术潮流的风范。几乎与《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同步起步的中西书局，在短短的十来年中，在中外典籍的出版领域，已经累累硕果。例如，从“汉译巴利三藏”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在汉语文献之外，世界文明的其他语种文献也有所呈现。从事汉语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出版社会色当行的题中之义；而从事其他语种文明载体的典籍出版，则困难重重。编一本以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语为主体、以拉丁字母转写为主导的龟兹石窟题记，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不言而喻。可以想见《龟兹石窟题记》的编排，也是孜孜矻矻，从头做起，不厌其烦地打通关节。一百多年前，引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伊始，即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以引进西学、

智能被用于扩大无人机使用范围，他们首先找到了谷歌，并试图对此进行保密。然而这个项目还是曝光了，逾3000名谷歌员工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于公司参与Maven项目的道德担忧。与谷歌的合作夭折，Maven项目“改嫁”Palantir。后者是一家初创企业，其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中情局关联的风险投资集团。克劳福德展示了Palantir的商业模式如何在地方警务和连锁超市运营过程中发挥作用。

创立多语种工具书体系等多种出版理念为特色，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无数第一。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移师北京，成为北方出版业的重镇。而上海的出版业，也已开辟了融汇旧学新知、辉映东西学术精神的新局面。

最后，让我感念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荣新江教授为代表的古籍整理队伍一直以来对丝绸之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荣新江教授秉承前辈学者的学术理念，从敦煌学起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敦煌，到吐鲁番，到塔里木盆地中的焉耆、龟兹、于阗绿洲，乃至更远的中亚粟特地区、伊朗高原的波斯和马可波罗故乡的意大利，荣新江教授的研究也沿着丝绸之路展开。丝路南北道上最大的两个绿洲文明——于阗与古代龟兹王国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几乎平行铺开。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的工作已经持续十年，而《龟兹石窟题记》的工程也有十年之后终于结出硕果。

平行展开的文献整理工作还不止这些。当《马可波罗游记》展现的13世纪东西方交流的时代历经700年之后，随着新史料的发现，重写翻译、整理和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为中西方文明交流提供新知识，也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增长点。在荣新江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系研修基地于十年前开启了“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读书班，旨在汇总世界各地丝路研究专家、共同培养学术新人进入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如今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也已提上日程。2012年，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研究中心”创建，荣新江教授即提出了“黄文弼文书”的概念，指称20世纪西域的考古探险时代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先生发掘并搜集到的西域文献资料，这是黄文弼本应拥有的荣誉；此后，在其初具规模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专门检出黄文弼收集品为《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予以专门整理。这部西域文书虽然未必有《龟兹石窟题记》的规模，但是其中汉文书书写的录文、胡语文书全新的解读，特别是其中的胡语涉及史德语、龟兹语、回鹘语等等领域，展现了黄文弼收集品对于西域文明史的全面贡献，也是值得期待的丝绸之路文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袁 裴《枫窗小牋》有一则关于洪乌的诗话深富意趣：洪驹父才而傲，每读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头头霜柿。人每献面而去。作为诗评，“使人齿颊皆甘”虽乍听似美言，一旦加上“不减头头霜柿”的譬喻，发问者即自惭而退，这说明背后有某种观念或情境在当时人所共知，因此毋庸深言即能褒贬自明。

这与宋代另一著名诗论有关，即以“橄欖”喻诗。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盛赞梅尧臣“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嚼。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并为其不受重视抱屈。欧阳修的譬喻贴切又精彩，既要深潜梅诗之味，又须熟悉橄欖一物的特性。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则要以较普遍的生活经验为前提。作为产于两广、福建一带的南国风物，橄欖从汉代已进入中原并见于文人、诗人的视野。从《齐民要术》来看，至少到晋代，橄欖果实先苦后甘的特点当时已为中原人所了解。不过唐前的诗文中几乎无人提到橄欖，大概此时主要还是宫廷进御，近侍也仅偶然能获得一点分赐，文人对其并不熟悉，偶有提及也多因其南方奇木异果的身份。唐诗中相关的也仅有白居易的两句诗：“面苦枕椰裹，酸酸橄欖新。”（《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对唐人来说，关乎橄欖，主要还是一种得自文献或传闻的知识，诗歌中不过偶一用之，意在图状异方风物，增添新奇效果。

到了宋代，橄欖却在诗歌中频繁出镜。相关诗语愈来愈多地使用，与此时代橄欖这一实物越来越多地进入文人的视野有关。对于大多中原地区的诗人来说，橄欖木木不见，橄欖之实则相对常见，几乎一切象喻皆从此果实生发，进而扩大了诗的材料和疆域。宋人以橄欖为诗料，不再仅以之作异方风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其果实回甘的特性，少数诗作咏其木物本味，大多或以之喻忠贞，或喻人生。王禹偁有《橄欖》诗，着力描写了橄欖果实的形态与滋味，橄欖不但获得了被写真传神的资格，也首次被用来与忠臣说言相比并。这一譬喻建立在本体与喻体皆苦尽方能甘来的相似特性之上，由于二者间明显的差异会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体验，因而显得如此妥帖和新妙，此后橄欖渐成为宋诗中不鲜见的诗语。

橄欖不仅肇生了众多诗语，而且很快成为诗歌本身的象喻，这正是始自前引欧阳修《水谷夜行》一诗的创辟。欧阳修借重了王禹偁诗以橄欖苦而后回甘的特性喻指宋人君子人格所奠定的这一心理框架，并引而申之，以之喻指一种新的宋诗之格，既贴切又生新，诗语的沿用也在稳定中又有变相。这一譬喻也为梅尧臣本人认可，称“欧阳我最知，初时且尚羞。比以橄欖，回甘始称述”（《寄空同以理》）。欧诗一出，橄欖这一诗料又生成了新的经典诗语，并在宋诗中以相当稳定的形态沿袭下来。

可以说，橄欖在宋诗中主要以象喻层面的诗语出现。其突出特征被抽象后作为象喻频繁使用，这当然削弱了橄欖一物本身的质感，使得这一意象中明显意味于象、偏于知性；但同一类型诗语较高的复现率，也使其迅速成为经典诗语稳固下来。这些象喻都是橄欖果实特性在单一方向上的抽象化，容易转化为当时诗人的常识，也因为复现率高而易流于钝化。这也可能是一些“意大于象”的意象诗容易导演的现象。

不论以橄欖喻忠贞、君子人格，还是以橄欖喻诗，都可以说是成功的诗语，而欧阳修以之喻诗则称经典。忠言谏论和君子人格，毕竟都为抽象，易流于浮泛，而一旦将其与梅尧臣所获西域文书相联系，其具体而微的规模，但是其中汉文书书写的录文、胡语文书全新的解读，特别是其中的胡语涉及史德语、龟兹语、回鹘语等等领域，展现了黄文弼收集品对于西域文明史的全面贡献，也是值得期待的丝绸之路文献。

另外，橄欖喻诗其实暗含着俗常诗之味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欖》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另外，橄欖喻诗其潜含着俗常诗之味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欖》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另外，橄欖喻诗其潜含着俗常诗之味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欖》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要之，何种事物会成为诗料，常常取决于它何时进入较普遍的生活经验，并被诗人发现和运用。橄欖如此，柿亦如此。但它以何种形式的诗语流行和经典化，则多取决于天才诗人的匠心与立意，一旦经典诗语被开创出来，其他诗人大多倾向于遵从典范并反复摹拟，使之具有较高的频率复现，同时他们也会追求一种相对的变式。事物一旦成为较常见的诗料和经典诗语，离诗话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也就为时不远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橄欖”“霜柿”。

『霜柿』『橄欖』与宋诗

孙华庭

于此。传闻异辞使得这则民间故事有枣与柿的不同，洪乌选择了以柿作譬，应该是缘于柿的形象更鲜明之故，不论作为实物，还是作为诗语。当洪乌讥评俗诗如同霜柿，既是对王禹偁、欧阳修、苏轼诸人之诗所奠定的以橄欖喻人格、诗格这一经典诗语的呼应、反馈、引申和强化，又进一步把橄欖象喻的本体从人格导向了诗格这一更加主流的诗语。先似苦涩而后能有回甘，也因此更成为宋诗经典风味的自我要求。

橄欖象喻在洪乌诗话中只作为背本味，大多或以之喻忠贞，或喻人生。王禹偁有《橄欖》诗，着力描写了橄欖果实的形态与滋味，橄欖不但获得了被写真传神的资格，也首次被用来与忠臣说言相比并。这一譬喻建立在本体与喻体皆苦尽方能甘来的相似特性之上，由于二者间明显的差异会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体验，因而显得如此妥帖和新妙，此后橄欖渐成为宋诗中不鲜见的诗语。

可以说，橄欖在宋诗中主要以象喻层面的诗语出现。其突出特征被抽象后作为象喻频繁使用，这当然削弱了橄欖一物本身的质感，使得这一意象中明显意味于象、偏于知性；但同一类型诗语较高的复现率，也使其迅速成为经典诗语稳固下来。这些象喻都是橄欖果实特性在单一方向上的抽象化，容易转化为当时诗人的常识，也因为复现率高而易流于钝化。这也可能是一些“意大于象”的意象诗容易导演的现象。

不论以橄欖喻忠贞、君子人格，还是以橄欖喻诗，都可以说是成功的诗语，而欧阳修以之喻诗则称经典。忠言谏论和君子人格，毕竟都为抽象，易流于浮泛，而一旦将其与梅尧臣所获西域文书相联系，其具体而微的规模，但是其中汉文书书写的录文、胡语文书全新的解读，特别是其中的胡语涉及史德语、龟兹语、回鹘语等等领域，展现了黄文弼收集品对于西域文明史的全面贡献，也是值得期待的丝绸之路文献。

另外，橄欖喻诗其实暗含着俗常诗之味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欖》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另外，橄欖喻诗其潜含着俗常诗之味不似橄欖（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欖》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人工智能的图谱

编译 本报记者 刘迪

人工智能成为人类观察、理解和经营世界的新兴方式，然而近日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利用这一工具的同时，也须及时反思其中的哲学与伦理问题，如“人工智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为它所困的”等。近日，微软 FATE（公平、责任、透明和伦理）团队的高级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访问教授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推出新书《人工智能图谱》（Atlas of AI，耶鲁大学出版社），她认为人工智能在字面上是致力于理解或寻求智能，但实际上如今它更多地是一本“权力登记册”，这个隐喻涵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人工智能对电网和大自然永不满足的欲望。

本书开篇“地球”一章，即讲述了锂和稀土元素开采过程中的破坏性，锂和稀土元素是人工智能生产力的重要原材料。在“劳动力”一章中，作者带领大家参观了位于新泽西州的亚马逊运营中心，进而反思“生产逻辑”的影响——机器及其建造者进一步要求人类（低薪的“码农”）与之实时同步。“情感”一章则展示了在警务、安全、法律、劳务、教育和精神医学方面，让机器自动检测人类情绪并不能消除偏见。

克劳福德以 UTKFace 为例，提示人们或许即便发现数据滥用也未必能改变现状。UTKFace 是一个从互联网上提取面部图像数据库，它采用了限制性的性别二分法和种族分类方案（从 0 到 4 的整数分别代表白人、黑人、亚洲人、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种），但从未试图联系以征得数据库中这些“样本”的同意，或向他们确认自己的性别和种族身份。此外，她还讲述了美国国防部的“Maven”项目。在该项目中，武器化人工